



论传教士对近代青海的认知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2-0149-11

● 张 科 马明忠

[摘要] 近代传教士有关青海地区的调查资料,不仅详尽实录了青海的地势、山川、民族、语言等内容,而且也记述了基督教在青海地区传教的历史和教会活动的情况,从中可以窥知近代传教士在青海地区传教的策略或方针。

[关键词] 近代,传教士,青海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从青海现有基督教教堂和信徒分布来看,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其在青海的传播与发展,与传教士对青海民族、地理的认知关系极为密切。近代传教士对青海地区传教的策略或方针是基于对青海地区地理、民族、语言、宗教等的认知而制定的,这种认知能反映出传教士在青海地区传教的区域、传教主体及传教的本质。传教士所留存的关于青海地区的调查资料,不仅详尽实录了青海的地势、山川、民族、语言等内容,而且也记述了基督教在青海地区传教的历史和教会活动的情况。对这些珍贵文献资料的梳理与研究,有利于探究近代传教士对青海地区传教的策略或方针,了解近代青海地区的社会关系。

一、青海的地理与政治区域

近代传教士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及青海各地,对于青海地理范围,不同层面的认知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反映出传教士对青海地区地理与政治区域不同的政治态度。

(一)从政治区域来说,青海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单位,又是中国本土和边远地区之间的缓冲地区

“青海是一个独立于新疆、西藏、甘肃、川边和四川的行政单位,是由上述各省的一部分组成的。”^①近代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1.

西方传教士把中国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中国本土,另一部分是边远地区,“边远地区即环绕中国本土四周的地区”。“这些环绕着内地的领土现在仍属中国,但与内地的联系在某些方面很明显地被削弱了。从西到东依次是西藏、新疆、(内外)蒙古和东北三省。”^①他们实际上把青海作为中国本土与所谓边远地区之间的缓冲地带。“建立青海这一行政单位的原因是要把中国本土的边境延伸到西藏。这样做并不是对西藏怀有敌意,而是中国当局害怕英国与西藏的关系和英国对西藏的态度,因此中国采取预防措施,尽量扩大外围边界以保护中国本土。”^②西方列强在近代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图谋边疆领土,特别是在近代西藏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如1906年6月,英、俄两国就重新分割在亚洲的势力范围问题进行谈判,英国代表声称西藏是“在中国宗主权管理下的一个封建国家,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并有权和临近国家就通商和边界缔结条约。”^③这暴露出英国图谋将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的野心。1907年8月,英、俄两国签订《英俄协定》,其中《西藏协定》充分暴露了英、俄两国妄图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的图谋。鸦片战争使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军舰大炮使中西关系发生转变,西方列强凭借武力和不平等条约,始终占据了主导和支配地位。与经济、军事侵略并行的是西方的文化侵略,传教士则扮演着“文化先锋”的角色,他们深入中国的各个省区,甚至到达军事未能触及的地区。因而,西方列强的政治图谋也反映在传教士对青海地理区域和政治区域的认识中。

(二)从传教未开辟地区来看,青海专指东部农业区

自清朝以来至1928年青海建省之前,青海地区一直隶属于甘肃,因而传教士把有关青海地区的调查资料都包含在“甘肃条目”中。从对基督教内地会在甘肃的分布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对青海的描述,如“西北部之内地会区,本区西部为青海山脉。青海湖一带原属蒙古族之定居地,但现有居民主要是西藏牧民。当地土著民族与藏、蒙、回、汉等族杂处其间,现已逐渐与汉族同化。”^④1911~1922年在西宁地区传教的天主教神父、比利时人 Louis Schram,也即许让神父,中文名字康国泰,他在西宁周边传教的时间达十年之久,认为“西宁是甘肃汉藏边界最重要的城市。1928年那年,这块广阔的边界地区才分离出来,组成了一个新的省——青海省,西宁成为其省会。”^⑤“农业人口定居地地区被划分为七个辖区:西宁、碾伯、大通、贵德、丹噶尔、巴燕郡和循化。城镇和大的村落周围的田地由汉人耕种,蕃人和蒙古人则在边远的地方,他们穿着不同于汉人的独特服饰,讲着他们自己的语言。汉人居住区边缘的南部、西部和北部是些定居的蕃人,他们耕种,也养牛羊。蒙古人住的区域被汉人分割成几块,他们住在界限分明的一些山谷里,那里汉人很少。说汉语的穆斯林则散居在各地。这一地区的南边住着讲突厥语的撒拉尔穆斯林。”^⑥从他的描述可以看出,传教士实际上把西宁府管辖的范围作为青海,这与清朝时期青海的建制设置有密切的关系。

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属甘肃省,下辖西宁、碾伯等县,尔后又辖大通县、丹噶尔厅、贵德厅、循化厅、巴燕戎厅,其疆域:“东至凉州府平番县界二百四十里。西至河拉库托营日月山青海界一百七十里。南至贵德所管都受番族界三百七十里。北至大雪山二百三十里,接连凉州府界。东南至三川黄河沿界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9.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51.

③ 近代史资料,1982年第2辑,第44页.

④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49.

⑤ [比利时]Louis Schram.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前言[M].李美玲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⑥ [比利时]Louis Schram.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李美玲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8.



四百七十里。西南至上郭密番族界二百三十里。东北至冰沟山写尔定番族界二百七十里。西北至扁都口张掖县界四百九十五里。”西宁府疆域地理形势是：“其隘则水抱西北，其险则山阻东南，北依山以作镇，南跨河而为疆。地接青海、西域之冲，治介三军万马之会，金城屏障，玉塞咽喉。”^①隶属甘肃的“青海”辖区为今青海东北部广大农业地区。

(三)从无基督教工作地区来看，青海是一个特别行政区

此“青海”专指青海牧业区，即西宁办事大臣管辖之地。如“应该注意的是，省及其辖区的机构是汉人居民的管理机构。大多数蕃人和蒙古人生活在这种组织之外（青海湖、柴达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由中国官方任命的办事大臣的监督下管理自己的事务。”^②“先前这个地区参加暴动的蒙古部落和蕃部落编入西宁办事大臣的管辖之下。”“分配给西宁办事大臣的部落包括青海湖的二十八个蒙旗和蕃境内的一个蒙旗，青海湖边重组的八个大的蕃部落群，玉树边界的二十五个设土司的蕃部落，以及独立好斗的 Ngoloks 蕃部落。”^③这些描述反映了罗卜藏丹津事件之后青海牧业区的管理情况。

清雍正元年(1723年)以前，青海蒙藏地区都派有理藩院司员驻扎西宁，办理有关事务。雍正二年(1725年)设“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办事大臣衙门初设于青海湖边的察罕城。由于该处气候寒冷，历任大臣多不亲往，而驻西宁市内，故又称西宁办事大臣。“这是对青海牧业区实行不同于内地的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域管理体制，其级别大约相当于行省一级。”^④西宁办事大臣全权代表中央王朝在青海蒙藏地区行使统治权，广大牧区归办事大臣管理。西宁办事大臣上隶于理藩院，管辖青海蒙古和硕特、绰罗斯、辉特、土尔扈特、喀尔喀诸部及青海各藏族部落，主持青海各旗盟会，并节制西宁镇、西宁道文武官员，掌青海之军政大计。民国元年(1912年)改西宁办事大臣为青海办事长官，民国四年(1915年)裁撤，其职改归蒙番宣慰使兼办。但传教士对青海牧业区的认识也有例外情况，如说“西藏包括青海、川边、西藏本部”。^⑤这可能由于当时西藏和青海牧业区民族大都为藏族的缘故。

二、青海的民族、语言和宗教信仰

传教士对于青海地区的民族、语言、宗教的认知，反映了近代青海地区的民族构成、语言情况和宗教信仰。他们通过对传教主体的认知，来确定他们的传教策略。

(一)民族

青海自元、明以来就形成多民族居住格局，传教士认为“本省居民成分复杂”^⑥，除了汉族以外，还有回族、藏族、蒙古族及土人。“这一地区居住着汉人、蕃人、说突厥语的撒拉尔人、说汉语的穆斯林以及自称蒙古尔而汉人称之为土人的人，土人之意为‘本地人，当地人’(autochthones)。”^⑦这反映传教士所面临的传教对

① (清)杨应据.西宁府新志·卷三·地理·疆域[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121~122.

② [比利时]Louis Schram.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李美玲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1.

③ [比利时]Louis Schram.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李美玲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8.

④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389.

⑤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98.

⑥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1.

⑦ [比利时]Louis Schram.甘青边界蒙古尔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前言[M].李美玲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

象复杂,由此而带来传教的种种困难。

1. 回族

传教士认为“甘肃省的回民比其他任何一省都多,统计总数在150万~300万之间。本省回民散居全省各地,人数不等,而且没有纯粹的回民居住区。”^①他们认为甘肃回族源自三个极不相同的民族:“回民又分为汉回、东乡回及撒拉回。”^②一是汉回。汉回主要来自阿拉伯波斯族,其祖先大约在618~907年来到中国,娶汉族妇女为妻,这些人的后裔称为“汉回”。他们具有异族血统,与信奉伊斯兰教的汉人不同。最重要的回族居住区,西部有西宁、河州、洮州等地。^③二是东乡回。“不论东乡回的来历如何,他们确实和本省的土著居民同属一族,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尽管语调不同。东乡回民在容貌体格方面与蒙族人相同。甘肃的东乡回民总数约在15万~20万之间。”^④这里的“土著居民”实际指的就是现在的土族。东乡族与土族的语言同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古语支,传教士认为东乡族与土族同属一族。三是撒拉回。“撒拉人主要居住在循化和巴燕戎郡”。^⑤“该族人的相貌很明显地不属于汉人血统。妇女的服装则与撒马尔罕人相似。撒拉族居住的山区现在划分为十三个‘工’,黄河以南有八工,以北有五工,工内语言各异,种族亦较复杂。人口总数约在5万~10万之间。”^⑥传教士的记述反映了当时撒拉族主要的居住地区、族源、语言及人口状况。以上描述反映出当时青海地区穆斯林民族的分布状况,如“西宁地区也是一个重要的穆斯林聚居区,有三个穆斯林群体,其中的两个一直在讲突厥语,另一个则讲汉语。”^⑦可以看出,传教士把东乡族和撒拉族都当作回族的一个分支。

2. 藏族和蒙古族

传教士对青海藏族和蒙古族的记述,反映了清政府管辖青海地区以来蒙藏之间的民族关系。如“藏族皆散居于本省西部边境。洮河以南有48个部族,其首领以极为重要的卓尼大喇嘛寺为常住地。青海藏民虽占多数,但有少数蒙古王公常驻此地。”^⑧这里的“青海”指青海湖地区,“青海即西海,在西宁之西四百里,海周千余里。”^⑨明末蒙古族不断进入青海湖地区,迫使环湖藏族部落移牧黄河以南。清雍正时期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后,编青海蒙古为29旗,划旗定界,并规定藏族部落定居河南,不得到黄河以北放牧。随着蒙古势力的衰弱,清乾隆时期,藏族部落不顾禁令,不断向河北移牧,至咸丰时,渡河北牧的八个藏族部落被清朝政府安置驻牧于青海湖地区,称为“环海八族”,由青海办事大臣管辖。自罗卜藏丹津事件以来,清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限制青海蒙古族势力发展的“抚番抑蒙”政策,致使在青海的和硕特蒙古由盛而衰,青海地区蒙古族分布格局发生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53.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50.

③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54.

④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54.

⑤ [比利时]Louis Schram. 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 李美玲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11.

⑥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55.

⑦ [比利时]Louis Schram. 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 李美玲译.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7.9.

⑧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651.

⑨ (清)梁份. 秦边纪略·卷一·西宁卫[M]. 赵盛世等校注.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50.



了很大变化。“青海湖一带原属蒙古族之定居地,但现有居民主要是西藏牧民。”^①除青海湖地区藏族与蒙古族交错居住,藏族部落逐渐趋于多数之外,其他地区都以藏族部落为主,如“保安为12个藏民部族之中心”。^②“西南部之宣道会区,河州(导河)、循化、贵德三城以南的居民就全都是藏民了。”^③这主要指今黄南地区的藏族部落。“除黄河北岸之贵德西部为国米(Kwo-mi)藏人居住外,其余均属草地,该草地内有少数之蒙藏两族人民散居北部,其南部则悉为藏人。”“国米(Kwo-mi)”实际指的是今青海贵德和共和一带的郭密等各藏族部落。^④“区极东南部——图中业已表明为果洛(Golak)地面——为独立部落,极野蛮藏人之居住地。该藏人通称为果洛族,向不受中国政府之节制。”^⑤“果洛族”实指“三果洛”,是对青海果洛地区藏族部落上郭罗克、中郭罗克、下郭罗克的统称。清朝时期,在行政区划上,今果洛藏族自治州黄河以北地区属青海办事大臣管辖,黄河以南地区则属四川省成绵龙茂道(治成都府)松潘直隶厅(治今四川省松潘县)的区划范围。^⑥另外在东部农业区藏族“有名字记载的蕃部有66个,此外西宁的七个辖区有52个有名字记载的定居地蕃人部落。……那些自称是部落的,实际上没有部落首领,部落事务通常由这个群体中的长者来处理。”^⑦从以上传教士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藏族分布在青海各地,主要集中在牧业区,蒙古族居住在环湖以西地区。

3. 土族

传教士把今日之土族称为“土著居民”,传教士对土族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如“本省约有五万名土著居民散居于各地。不少土著居民至今仍然保持着他们古老的风俗习惯和服饰,特别是妇女,其余土著居民则极易与汉人同化。”^⑧Louis Schram把土族看作是蒙古人:“这个地区的汉人普遍理解是:蒙古人是最早的居民的后裔。”^⑨“不过,土人一词对西宁的汉人来说有一个特殊的词义,他们用这个词时只指蒙古人和沙陀人。”^⑩这也是至今学者们对土族族源的看法无法统一的一个原因。对于外国人眼中的蒙古人,Louis Schram罗列了多种说法,但没有统一的定论。他认为:“在西宁的七个辖区里有十六个蒙古部族(clan),还应该加上住在平番辖区领地里的连成部族。”“蒙古部族(不包括沙陀部)在元代(1260~1368年)就出现在西宁地区。元朝被推翻以后,他们归顺了明朝。明朝给每个蒙古部族首领划分了固定的领地,与此同时,给西宁地区的蕃人也同样划分了领地。但蕃人受汉人辖区官员的直接管理,而蒙古人虽然其领地在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3.

②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2.

③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6.

④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 青海通史[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337.

⑤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82~683.

⑥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青海省志·建置沿革志[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1.413.

⑦ [比利时]Louis Schram. 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 李美玲译.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8.

⑧ [比利时]Louis Schram. 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 李美玲译.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8.

⑨ [比利时]Louis Schram. 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 李美玲译.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17.

⑩ [比利时]Louis Schram. 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 李美玲译.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2.

汉人辖区的包围之中,却直接由他们本族首领管理,是一种独特的地方自治。”^①这里指的是今甘肃和青海的土族以及土族的管理制度——土司制度。

(二)各民族语言

语言是各民族之间交往、联系的工具,也是传教士针对不同传教对象所要了解或掌握的工具,以便于他们与传教对象的交流。传教士认为甘肃语言异常复杂,而特别是甘肃西部和西北部,成为发展教育事业和布道工作的一大障碍。甘肃西部和西北部主要是指青海,那里各民族语言复杂。如“除汉人外,巴燕戎格(巴戎)以南之萨拉耳回民通用的语言与土耳其语相似;河州(导河)以东的东乡回民的语言又近似蒙古语,还有一小部分回民讲阿拉伯语。”^②“巴燕戎格以南”指今化隆甘都及循化撒拉族讲的突厥语,传教士认为撒拉族的语言中夹杂着大量的汉语与藏语,只有东部的 Menda 工讲纯粹的土耳其语。该族大部分人通晓汉语,但本族人之中则男女老少只使用撒拉语。^③Menda 工是指今循化孟达地区,实际上撒拉族语言内部比较一致,主要是根据语音上的一些差异,分为街子和孟达两个土语区,孟达土语主要分布在今循化孟达、木厂、它撒坡等地。“河州以东”是指今临夏以东,那里的东乡族讲东乡语。回民讲的“阿拉伯语”,是指在甘、宁、青一带流行的“小儿锦”,实际指将经堂教育中所学的经文由阿拉伯语译成汉语,成为学习汉语、记事、通信的工具。“回族地方,这些地方均通用汉语,只是在社交或宗教礼仪方面使用大量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汇。”^④这反映了无论是近代还是现在,汉语和汉字是回族通用的语言文字,只是在宗教生活中因伊斯兰教信仰,而使用阿拉伯语与波斯语词汇。

关于土族使用的语言,传教士认为:“约有五万名土番人居住于西宁东北之山谷中,其语言自成一调。同一地内口音歧出,如此复杂之语言对各差会宣教事业影响极大,使外国宣教师在学习本省语言方面备感困难,发展教会文字事业、开办教会学校更非易事。”^⑤土族语言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为互助(包括乐都、天祝)、民和(三川地区)、同仁三大方言区,各个方言区间有一定的差异。互助方言又有哈拉直沟、红崖子沟、那龙沟、大通的四种土语。天主教神父、德国人德斯迈(A.de.Smedt)和孟塔尔(A.mostaer)曾收集互助沙棠川那林沟语言材料。^⑥1994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土族格赛尔》依据的就是德国人施劳德从说唱艺人那里搜集,并用拼音文字记录的格赛尔故事,有利于土族历史、文学、宗教、语言等方面的研究。

关于藏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传教士认为:“藏语和汉语一样分为文言和白话两种语体。文字主要在僧侣中使用,白话则分为无数土音。在甘藏边界一带布道的宣教师发现 Drokwa 土语使用最广,甚至可以通用到拉萨。”^⑦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分为卫藏、康、安多三大方言,青海地区主要以安多方言为主。尽管各地方言有别,但藏文在各地是统一的。

① [比利时]Louis Schram.甘青边界蒙古人的起源、历史及社会组织[M].李美玲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7.9.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19.

③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4.

④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4.

⑤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19.

⑥ 牟一之.青海民族史入门[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181.麻宝珠.天主教传入互助地区的概况.互助文史资料[C],第2辑,1994.

⑦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1.



(三) 宗教信仰

青海自元、明以来,在多民族居住格局下多宗教共存,蒙古、藏、土等族信仰藏传佛教,回、撒拉、保安、东乡等族信仰伊斯兰教,一些地区还有一些原始萨满信仰。传教士认为,青海地区地处西陲边远地区,宗教对人们的信仰影响较大。“本省远在西陲,一向被人忽视,长期闭关自守,人民久受喇嘛教的束缚,异教的迷惑以及伊斯兰教对他们的灵魂的不利影响,加之宗教制度极不完善,不能给人们带来生命和光明、力量和纯洁。”^①“本省边界藏民中的佛教徒分为红、黄、黑三派,各主要喇嘛寺院都驻有活佛。”^②由于天主教较早传入,基督教宣教士把天主教视为异教,加上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影响,基督教宣教遇到极大的阻力。因此传教士认为,青海“居民尽属佛教徒,共分黄红二教。黄派为改良佛教徒。”^③红教指的是藏传佛教宁玛派,黄派指格鲁派。“蒙古族人的宗教信仰和藏族人相同”。^④“土著居民中也有信奉伊斯兰教的,但多数人是喇嘛教徒并向头人纳税。”^⑤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著居民实际指的是同仁地区的保安族,其族源与土族相近,但大部分“土著居民”主要是指土族,信仰藏传佛教。

三、传教士在青海地区传教的策略

近代青海基督教教堂大多集中在东部农业地区,主要分布在民和、乐都、互助、大通、湟中、湟源,农业区与牧业区交界地区也有部分堂点,如贵德、循化、化隆、同仁地区。传教士关于青海地区地理、民族、宗教、语言的认知,实际上关系到如何在不同国家、地区、民族、语言群体、信仰群体中传播基督教的问题。“基督教会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真空之中,它影响所在地区的国家和社会,同时也受它们的影响。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民的性格、宗教和社会实践、工业发展状况、教育和经济状况等从物质上影响着宣教工作和基督教事业的发展速度。”^⑥

1877年,基督教内地会开始在藏族地区传教,曾派人在青海地区考察了解。“1877年1月内地会之伊斯顿(Easton)帕克(Parker)二先生进入本省(甘肃)为本省宣教事业之开端。在此创业时期内(1878~1900年),宣教师遍游全省各重要地区并随处分发六种语言之经书,足迹远至新疆之宁远。”^⑦1885年,清政府允许兰州、西宁、宁夏三城开放为基督教宣教区,“西宁总堂负责藏民中之布道工作,宁夏总堂则负责蒙族人中之布道工作。”^⑧1888年,杜君(Cecil Polhill)偕其夫人建设甘省西宁之总堂,并在藏人中继续开辟工作,厥后复在川省开辟松潘为本区事业之中坚。”^⑧但传教士认为:“交通不便是最大的障碍和阻力。本省1/3以上之居民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6.

②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1.

③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83.

④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3.

⑤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3.

⑥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序言(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0.

⑦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24.

⑧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91.

为穆斯林,又有藏、蒙、土番诸民族杂居其中,极难接收基督之信仰。”^①这反映出,青海复杂的地理环境使传教士难以与外界沟通,加上不同群体的不同信仰,传教面临巨大的困难,因而传教士针对不同民族、不同地理位置选择传教方式或方法。

(一)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把河湟谷地城镇作为宣教首选地

传教士认为要想建立永久布道事业,必须建立宣教师驻地,他们在沿边境的商业城市如丹噶尔(湟源)、贵德设立宣教师驻地。他们认为,如想在青海长久地开辟传教之地,与蒙古族、藏族人交往,就要在商业城镇设立“差会永久之驻在地”,建立医院或医疗诊所是最有效的办法。“与青海人民接洽,最适当之办法须于本区湟源县(Hwangyüanhsien)开辟一巩固之中心地。”^②湟源“为青海要冲,西藏总隘,汉、土、夷、番交易市所”^③,是连接农业区和牧业区的枢纽,也是蒙、藏、回、汉各族人民进行经济贸易的地方,商业极为兴盛,因而传教士看重湟源特殊的地理位置,建议建立医院来扩张传教事业。传教士将“贵德与上述湟源相提并论”,^④认为“碾伯地理位置极好,很适于在汉、回及各少数民族中间推行工作。毛伯胜位于西宁西北部大通地区,该地及附近一带是穆斯林聚居地区,并可作为在汉、藏及各少数民族中开展工作的理想的根据地。”^⑤“碾伯”即今乐都,“毛伯胜”即今大通城关镇毛伯胜村,是近代汉、藏、回、土等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因而在近代青海地区形成了以西宁为中心,沿湟水河的湟源、湟中、大通、互助、民和、乐都和沿黄河的贵德、同仁、循化、化隆村镇为基地的传教地区,并且辐射牧区各民族。至青海解放前夕,全省共有天主堂8座(下辖分堂25座),基督教教堂19处。^⑥

(二)针对不同民族采取不同方法

“本省居民成分复杂,在各民族中进行特别工作实为当务之急。除汉人外,有两个阶层的人民亟须给予注意:一为藏、蒙及各土著居民中的佛教徒,一为穆斯林(包括汉回、东乡回、撒拉回)。”^⑦实际上,自西宁获准开放为基督教宣教区以来,传教士就把西宁作为向藏族布道工作的中心,即以西宁为中心向外推广布道事业。同时凡是连接藏族地区的地方都设置宣教点,传教士认为在青海适宜开展布道工作的特别区“仅有吉昆图(Jyekundo)”。“吉昆图”即今之玉树结古,当时是连接川、藏、青的交通要道。“该区亦可为宣教事业之中坚地,盖因四境之藏人均须来此购买货物也。各种货物均由蜀省边境输来,故由边疆推行工作自该处入手最为便捷。”^⑧有的地方因为缺少宣教职员,传教士仅仅散发宣教资料而已,如“曾在塔尔寺一带分发过藏、蒙文《圣经》,其地布道工作甚少。”“保安为12个藏民部族之中心,宣道会曾一度在这里开辟工作,后因故撤出。”^⑨传教士宣教的意图

①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324.

②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83.

③ 王昱主编.青海方志资料类编(上)[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458.

④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83.

⑤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49.

⑥ 青海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宗教志[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0.381、391.

⑦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1.

⑧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83.

⑨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1.



很明显,就是建立传教基地。“不久即可在沿西藏边界一带所有市镇及各重要喇嘛寺院等地建立起一系列的差会总堂”。^①把牧业区城镇和寺院作为未来传教工作的首选地。从现今青海地区遗留的教堂和教徒分布,可以看出传教士为何在湟源、贵德、互助、大通、同仁、循化、化隆设置宣教地。

1.对藏族的布道

传教士认为,在藏民中旅行布道虽极为艰苦,但在观赏风景的同时,可以体察各地风土民俗,特别是能给深居黑暗中的百姓带来“真道”即基督福音。其他布道方法则是携带护兵及武器,或乔装旅行,但这都不是积极的办法。内地会自1891年有传教士到西宁后,陆续在青海各地布道设点。最早进入塔尔寺的传教士是瑞吉纳特(Petrus Rijnhart)。1892年,瑞吉纳特来到青海湟中的鲁沙尔。瑞氏在此积极进行传教工作,这主要是通过和喇嘛们私人交谈的方式进行的。除了传教外,他还对周围的牧民地区作了访问,用自己有限的医术为人治病。他抓紧时间揣摩藏人们的心理,认真研究他们的生活习性。他决定以鲁沙尔为传教基地,因为这里有地形上的便利。这里有三条路,一条通内地,一条通蒙古,一条通拉萨。此地为交通中枢,所以能见到更多过往的人,并可以传教,生活也较为方便。这里有蒙、藏、汉人,也有一些突厥穆斯林,是个学习及交流语言的得天独厚的地方。1895年,他们与塔尔寺的堪布弥纳佛爷交上了朋友,该佛爷时年27岁。瑞吉纳特经常去与他聊天,还给他看了藏文的福音书,该佛爷赞扬耶稣基督是西方菩萨。^②瑞吉纳特夫妇在青海等地的传教及青海地区群众对基督教的想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基督教与藏传佛教两种不同宗教信仰的碰撞和互动。此后传教士络绎不绝地进入藏族地区。如基督教新教英国牧师胡立礼夫妇来西宁传教,设立福音堂,即现西宁教场街基督教堂。该福音堂当时为向藏民传道的处所,有接待藏族群众的宿舍,室内设火炕,备有火盆、炕桌、壶碗等用具,院内马棚为拴马喂草料之处。来此听福音的人,一律免费住宿,内有藏族群众、满巴(医生),也有有钱的人,每天陆续不断的来往听道者常有三十左右人次。每礼拜天晚上7点至9点聚会,备有藏文《圣经》,由化隆县人董福堂负责以藏语译讲。每年到农历正月十五,教会派三四人去塔尔寺,带藏文《圣经》及各类藏文书刊单张,免费向藏族群众散发。^③内地会传教士、英国人连福川(F.D.Learner),于1911年到达西宁,主要在西宁藏民中传教。他在西宁府开了一家“福音客栈”,用以传播基督教,客栈有藏、蒙、土族人等居住。通过这些房客,他将《圣经》分发到房客旅行所到的各个集市,认为此举比他在任何所到之处都做得成功。在1914~1920年,连福川曾到大通的毛伯胜、贵德、化隆的巴燕戎格、乐都的碾伯以及湟源藏族地区传教,^④因而也出现了喇嘛开始研究基督教的情况,如青海喇嘛领袖古伦子林(Kurung Tsering)来信索要有关基督教历史及天文、医学的书籍。^⑤信中内容是否可靠真实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传教士的活动引起了藏传佛教僧人的注意。

2.对蒙古族的宣教工作

传教士认为在本省及沿省界一带的蒙人中还没有确定的宣教计划,认为在青海蒙古族地区传教,时机尚未成熟。“于青海北部各地,可得蒙王保护而游行于蒙人之中,盖蒙王等与宣教师之感情颇形融洽,然现今尚非宜于久住之时期也。”^⑥但近代也有蒙古族信仰天主教的,如固始汗次子鄂木克,也记载为鄂托克,其后裔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4.

② 房建昌.加拿大基督教传教士瑞吉纳特夫妇在青海藏族地区的传教活动及其他[M].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2).

③ 伦连泉.我所知道的西宁基督教会[A].青海文史资料集萃·民族宗教卷[C].西宁民族印刷厂,2001.378.

④ 王慧.1877~1920年的甘肃基督新教[D].兰州大学2007级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⑤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95.

⑥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83.

群科旗最后一位王爷丹增,20世纪初期传教士来后住在其庄廓里。经常去教堂礼拜的群科蒙古人有干亲老太太、李应德夫妇等。丹增王爷的外甥斗里,是群科旗一财主,居住在狼湾(今湟源县巴燕乡),30年代有西方传教士居住在他家,他信教且会英文。另外一对基督教夫妇——李应德夫妇作为蒙古人,迁往巴燕乡福海村。^①这些例子说明青海地区蒙古族信仰天主教的历史事实。

3.对回民的基督教工作

传教士认为在全国汉回中的特别工作尚在萌芽时期。甘肃基督教内地会和宣道会划分传教工作区域和传教范围:“河州专为汉回工作,循化专为撒拉回工作,河州区内及其东部各地专为东乡回工作。内地会决定在河州一带的回民中开展工作,宣道会则继续在汉、藏二族居民中进行工作。回民中的特别工作已由西宁内地会承担。”^②1895年河州回民起义期间,内地会的英国传教士胡立礼(Ridley H.F.)夫妇与霍氏(Hail)先生被困在西宁府,他们每天负责照料几百名穆斯林的饮食,并借此机会教唱基督赞美诗及基督教真谛。^③西宁教会祁家场,是对回族群众的谈道所,每天有四至六名伊斯兰教的阿訇到来,专门研究基督教《圣经》的内容要义。海春深牧师熟悉阿拉伯语言文字,研究《古兰经》颇有造诣,他借机向回族宗教人员及回族群众传播基督教义。^④化隆地区福音堂发展较快,信徒中既有农民,又有市民,还有知识分子,既有汉族,又有回族,信徒最多时达三十多人。^⑤循化境内“除美国宣道会教师海映光设有教堂一处,以便传教外”,^⑥“特别注意向撒拉的布道。有骆先生夫妇二人新由美国来,预备作此种工作。”

4.对土族的基督教工作

传教士认为,还没有宣教师计划学习土著居民的方言以便专门在他们中间从事宣教工作。但他们认为:“本省约有五万名土著居民散居于各地。不少土著居民至今仍然保持着他们古老的风俗习惯和服饰,特别是妇女,其余土著居民则极易与汉人同化。”“近年来,土著居民中发生了许多变化,正是在他们中间宣传福音的大好时机。”^⑦实际上在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进入土族地区传教时,天主教神父早已进入该地区布道,如1913年互助沙塘川甘家堡建立天主堂,由德籍神父孟明道主持,下设总寨分堂、新苑堡分堂、羊圈分堂、白崖分堂(哈拉直沟)。1914年,互助东山大泉村建立“圣母”堂。威远镇寺壕子街修建了一座规模比较大的天主堂,由甘肃籍神甫段文辉主持,下设桦林沟分堂(东和乡)、老虎沟分堂、大同苑分堂、上马圈分堂、下马圈分堂。到解放前夕,全县共有天主教徒709人。^⑧至于土族中信奉基督教者,至少有个案能说明其存在。如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提及的“桑达钦巴”即三川察哈蒙古人,书中说:“桑达钦巴将其家迁到了鄂尔多斯,该家庭在那里受了归化。其侄子在喀喇巴勒哈逊的小基督教会口中成了小康人家。”^⑨另外,在 Louis Schram 和伯希和的著作中都提及有关“桑达钦巴”的情况。^⑩

① 南文渊.可可淖尔蒙古——走向边缘的历史[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269、568、570.

②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4.

③ 房建昌.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兼论近代西方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穆斯林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J].西北民族研究,1994(1).

④ 伦连泉.我所知道的西宁基督教会[A].青海文史资料集萃·民族宗教卷[C].西宁:西宁民族印刷厂,2001.378.

⑤ 本书编委会编.化隆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691~692.

⑥ 王昱、李庆涛编.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112.

⑦ 甘肃图书馆藏.西北的呼声[Z].1935.9.

⑧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4.

⑨ 麻宝珠.天主教传入互助地区的概况[Z].互助文史资料(第二辑)[C].1994.85.

⑩ [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M].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298.



5.对汉族的基督教工作

传教士认为,在青海传教的对象主要还是汉族。“除大片未开辟地区及不宜开辟工作的地区之外,尚有大批非汉人团体至今仍然全部或几乎全部没有宣教事业。”这意味着在汉族中传教相对容易,“汉人中的布道工作发展也相当迅速,近年来,一些过去在藏民中工作的职员转而专门致力于汉人中的更为急需的布道工作,致使差会职员顿感缺乏。”^①一些资料反映的信教者也主要是汉族,“如耶教、天主教、道教,则信之者仅少数汉人,势力微弱,与佛、回教相较,相差远甚,殆为汉人宗教观念薄弱所致。”^②同仁县虽地处牧业区,但信教者仍然是汉族居多,如“美国教堂二处,民国十四年建修,宣传耶稣教,每堂留居中国二人布道。入教汉民四五家。”^③

[收稿日期]2010-03-20

[作者简介]张科(1972~)男,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西宁 810000
马明忠(1968~)男,撒拉族,中共西宁市委党校副教授。西宁 810000

On Missioners' Understanding of Qinghai in Modern Time

Zhang Ke Ma Mingzhong

Abstract: Both the condition of terrain, mountains, ethnic groups, languages in Qinghai and the missionary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ity, as well as the activities of church, are thoroughly recorded in missioners' survey data, from which we can find the strategy the modern missioners used to preach their religion in Qinghai area.

Key words: modern time;missioner;Qinghai

“蒙古国文化周”搭建中蒙文化交流桥梁

据新华网5月3日张玥报道,5月2日,蒙古国文化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开幕。这是蒙古国首次在内蒙古自治区举办文化周活动。内蒙古博物院蒙古国摄影艺术展展出的70余幅摄影作品,充分展示了蒙古国的自然、文化、历史等方面,吸引许多观众前来参观。除了蒙古国摄影艺术展以外,在蒙古国文化周期间还将举办“蒙古国文化周”开幕式晚会、蒙古国电影放映周等活动。市民可以欣赏到蒙古国的经典艺术作品和蒙古民族原生态文化,以及蒙古国流行乐团的精彩演出。蒙古国文化周在五一假期启动,使内蒙古博物院的客流量大增。据不完全统计,仅5月2日,来内蒙古博物院参观的游客已超过1万人次。(鸣摘)

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 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M]. 蔡詠春、文庸、段琦、杨周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650.

② 高良佐.西北随记[M]. 雷恩海、姜朝晖点校.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91~92.

③ 王昱、李庆涛编.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C].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175.